

## 卷首语

本期企图呈现目前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三种重大转折。

第一，是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2005年，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他指出希腊城邦开始了国家政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则开创了世界政治。紧接着杰出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统治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思考方式，逐渐广为人知，引起世界思想界的重视。特别是2009年，著名的人文杂志《第欧根尼》（*Diogenes*）刊发了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更是引起了众多的热议。正如本刊主编，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所说：“一个更新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和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关于“天下体系”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还仅仅是开始，会有很多质疑和不同意见。这里发表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柯岚安教授就认为虽然“天下体系”已成为“普世性世界政治模式的来源之一”但仍然有着严重的理论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看，“天下体系”本身也还需要一个扬弃和重新诠释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研究在国际这一层面上，这一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普遍可操作？它与其他模式之间是否兼容？是否可通约？如李比雄所说，这些都是跨文化研究试图提出和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重新思考。“情与知识”是本期的主要栏目。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力量，从而造成“情”的退位。但是正如海德格所说，人类不应凭恃自以为无往不利的科学理性去分析、分解对象，因为其结果恰恰是遮蔽了对象本身，好比“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这也就是庄子提倡“绝圣去智”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去蔽，藉以达到空明若镜的心境。这就是为什么在理性工具和技术工具之外，还必须强调“审美境界”、“诗意栖居”和情感之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两位教授提出的，如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只强调知识的灌输和智力的增长，而缺少系统地对高贵情操和情感体验的培育，很值得警惕。

为进一步探讨高贵情操和情感体验的问题，本期特组织了有关周宁《人间草木》一书的圆桌会议。王国维在谈到《红楼梦》时，曾慨叹中国小说较多讲述生活故事，而很少像浮士德那样，作“灵魂的叩问”。《人间草木》的创新处正在于将一个学者深邃的思想融入他所探索的一个个伟大的灵魂之中，让读者谛听作者与那些伟大灵魂的真挚而激情的对话。这本书超越时空，开辟了空前广阔的跨文化平台，写了四组八个人：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正如一位发言者所说，无论是传教士的尘世荣耀，还是学者的求真守身，乃至文人的诗性沉思，都以一种奇异的辉光渗入到我们的生命世界中来。近年来，周宁以8卷本《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础，并向其高峰延伸。这本书的文体不能为任何既成的文体所约束和规范，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自有其特点。贝多芬曾说：“它来自心灵，也将抵达心灵。”周宁用“心”在书写，它也必将获得心灵的真诚回应。

第三，是从片面的现代文明研究转向在“经典”与“解释”之间来发展中外学术。其实，一个不依赖任何过去的经典而独立存在的思想个体是很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自古便是对经典的传承。这种传承包含了不同时代对经典的解释，同时就融合了那一时代人的思想和精神，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一个古今

中外文化交融的发展过程。本刊多次介绍过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关于“了解希腊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论点，他认为要真正懂得希腊，就必须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在参照中来进行反思。今天，刘小枫提出在当下要持守住中国文明传统，也必须从理解西方现代性问题入手，并由此反观古典西方与现代西方的巨大差异。“有了如此洞识，才能摸到回归自家经典的道路——并逐渐从对西学经典的解释推进到对中国经典的解释”。本期关于“儒学与杜威”的讨论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另外，特别要提到的是本期集中报道了我们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的长期合作项目“农民、农业与现代化、全球化”。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谢扬的“全球化变迁中的中国西部三农问题考量”更是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的新问题，值得细读。

最后，尚须一提的是秦海鹰教授的《钱钟书与布雷蒙》，这不仅代表了本刊对中国跨文化文学研究的奠基者钱钟书先生百年冥诞的纪念，同时也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法国“纯诗”理论的中国解读。